

Total number of document(s): 1

1 .Ming Pao Daily News | 2010-12-12
Newspaper | P10 | 讀書 | By 謝傲霜

邱禮濤又傾又砌管治詭計

邱禮濤，公眾對他的第一個身分印象，必定是電影導演。我們可以說，沒有電影，就沒有邱禮濤。所以當他想將自己於2006至08年就讀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期間撰寫的包括禁煙問題、香港歷史書寫、裸照事件、奧運政治等文章結集出版時，編輯們最終還是決定給它這樣一個書名——《一個電影導演的文化思考與實踐》。

不過，這本書絕不限於電影。我們在裏面讀到的，可會是一個熱切關懷香港人生存狀態的身影，他深沉地思考着，然後條分縷析地告訴我們，人當如何從管治權力的詭計中覺醒然後行動。

文謝傲霜圖郭慶輝

禁煙的統治邏輯

這本剛出版的新書沒有序言，問邱禮濤何以不寫序，他從容自若地答道：「書不一定要有序。」或者我們可以說，就是這種「不一定」的基調，讓他的電影、文字以及思維存在更多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卻是抵禦既定權力框架的最有力武器。就如當禁煙成為理所當然的常態和共識時，他在書中〈禁煙的詭計〉一文中卻寫道：「對吸煙者的規管，意味着對日常生活行為的規管，也意味着如何在『修辭』和『技術』上合情合理合人權地限制自由，如何政治地把『私人』放置在『公眾』的理性語境來誘發衝突和矛盾，把本來並非必須的法規變成理所當然，把本來違反人權的規管變成合法……弔詭的是，當人們拱手交出自由和權利之時，他們還以為自己是自由的、還以為自己仍享有那本來是自有永有的人權。」

在訪問過程中，邱禮濤吸食一支又一支香煙，長及肩的頭髮和瘦削的臉容在雲霧繚繞間流露沉着鎮定，正如他的文章，一切論點有根有據，絕非隨意抒發一己之見，文中引述成員包括學者和科學家的非謀利網絡FORCES International 指出，根據FORCES的數據，以人均壽命74歲作為基礎，如果明天所有不計成因的癌病都消失，人們最多可比之前長壽15天，而假設之前以「三分之一的癌病是吸煙所致」作為結論的研究報告是真的，消除吸煙只會讓人們比之前長壽一點點。對邱禮濤來說，「作為人，愉悅和自由選擇的權利其實跟健康一樣重要。」更何況獲得的健康與失去的自由根本不成比例。

經濟的審查控制

同樣，現正身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博士生的邱禮濤，他所撰寫的博士論文是從禁片探究電影審查制度如何規管思想、說話與言論自由，同時他亦在該校任教Film, Censorship and SocialChange，質詢禁片的「不一定」性。

要他比較九七前後的電影審查模式，邱禮濤答道：「九七前較主要是立法規管，但現在的審查不再是明目張膽，而是透過經濟手段以自我審查的方式更利害地進行控制。所謂的CEPA電影表面上提供很多商機給香港電影製作人，但內裏行的卻是另一種censorship。就範於這麼龐大的市場，其實就是容許經濟形式去規限電影的內容。」

其實CEPA（更緊密經貿合作安排）影響的範疇，又豈止於電影？「文章以電影作切入點，但討論的絕不限於電影，正如Michel Foucault談sexuality不止是討論sexuality，而是整個社會對個體的規管模式。」邱禮濤說，「商機需要付出，這是遊戲的潛規則，否則你就無法生存。」但是為了生存，其代價又是什麼呢？邱禮濤指出，以CEPA電影為例，後果是港產片之死，而絕不是官方媒體中所說的香港電影因CEPA重生。

本土文化被視如糞

邱禮濤所定義的港產片，如他自己所執導的《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飽》，是高能量而肆無忌憚的電影，「哪裏有電影像港產片般寫黑社會、鬼故事等寫得這麼色情、暴力？這麼放任？就是這種過分，構成了我們所熟知的港產片，但現在這種獨特的過分卻被扼殺，只剩下A貨荷李活片和與大陸合作的CEPA電影，沒有了我們從小到大所看的港產片，所以現在港產片也很需要保育！」

如果根據邱禮濤的推論，電影只是一個切入點，那麼香港文化當下又面對着怎樣的處境和考驗？書中〈記不了／忘不掉：誰的香港？〉一文中就引用《東坡禪喜集》裏蘇東坡與佛印那心中是佛看到對方是佛，心中是糞看到對方是糞的故事，指出特區政府心中的「一坨糞」，使官員們誤認「明歷歷、露堂堂」的本土文化為不足取的東西。「強調發展、經濟、消費和娛樂是香港現時的文化邏輯，也是霸權統識的意識形態。對他們來說，GDP和恆生指數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除此之外，其餘一切由市民活出來的地道文化，如果不是視而不見，就是把一切有利資本家以外的東西看成『一坨糞』。」邱禮濤寫到。

和資本主義打成一片

要政府不把地道文化視為「一坨糞」，覺醒只是第一步，無論是管治者的覺醒還是被管治者的覺醒，但要扭轉形勢，行動實為必須。或許編輯是看透了邱禮濤為人處事的特質，故以《一個電影導演的文化思考與實踐》為書名，尤其書中起首文章〈拍電影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研究的策略〉，實在是邱禮濤修讀文化研究後對自己透過《等候董建華發落》、《陰陽路3之升棺發財》、《給他們一個機會》和《性工作者十日談》等電影進行參與式行動研究的反思與確認，「在我讀文化研究之前並不認識參與式行動研究participatory actionresearch這術語，但我原來一直已在做，就像我認識香煙這個詞語之前，我其實已經不斷在食這含尼古丁植物卷起來的紙條一樣。」邱禮濤比喻說。

在這作為全書第一篇文章，邱禮濤起首便如此解釋他一直進行的參與式行動研究，即其部分電影的拍攝工作：「過去數年，並不安於本分但又不能離開本位的我，嘗試了在既定本位之中尋找方法，作一些社會性實踐，把自己放置在社會大論述（grandnarrative）之外，一個為邊緣和弱勢社群發聲的另類位置，並以電影介入和干預（intervene）社會，騷動主流社會的價值觀。光是『發聲』，只是表現立場和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立場，但我相信最能申明立場的其實就是具體行動。如果必須說明意圖或目的，那就是一個企圖改變主流意識形態的參與和行動；過或預知的目的地。」

可是在資本主義下以拍攝商業電影的策略，作為文化研究及改變主流意識形態的行動，邱禮濤還是不可避免地要尋求投資者的支持，於是也就不可避免在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下經營，和不可避免由此而生的經濟壓力對電影內容的審查控制。「就像打仗，對敵有兩種主要方式，一是上戰場明刀明槍開火戰鬥，一是派卧底到敵陣進行破壞。」邱禮濤說，他不是刻意選擇後者，只是本性使然的分工，他在書中如此寫到：「……最基本的，就是不要抗拒那套語言，不要介意做一個『俗世人』，而事實上，只有同時甘心做一個俗世人，才能夠超越知識層面，由衷地領悟到民間疾苦和人世間的不正義。」

但卧底方式最為人詬病的是有被同化吸納的可能性，邱禮濤的答案是在堅持最根本的原則同時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你以為贏時你輸了，你以為輸時你贏了，這是理性的詭計，就如拿破倫攻打歐洲是為做皇帝，怎料這場戰役卻反過來瓦解了整個歐洲的君主制度。」

邱禮濤

1981年入讀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在學期間已是獨立短片活躍分子。1984年投身電影工業至今執導及攝影超過一百部電影，涉獵類型繁多，導演的《八仙飯店之人肉叉燒飽》和《伊波拉病毒》被歐美影評人譽為cult classic。《等候董建華發落》曾應邀參加第51屆柏林影展成為Panorama的開幕電影和獲得國際天主教視聽協會華語電影「金炬獎」。此外曾創辦《中國青年周報》，著有《大搖大擺》、《這個女兒真爆炸》等作品。現為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博士生。

《一個電影導演的文化思考與實踐》

作者：邱禮濤

出版：進一步

DOCUMENT ID: 201012120040035

Source: Wisers electronic service. This content, the trademarks and logos belong to Wisers, the relevant organizations or copyright owners. All rights reserved. Any content provided by user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user and Wisers is not responsible for such content, copyright clearance or any damage/loss suffered as a result.